

# 元朝陇南吐蕃的行政机构与社会经济

刘建丽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关键词]元朝;陇南吐蕃;行政机构;社会经济

[摘要]元朝统一全国后,为了对吐蕃聚居的陇南地区加强镇戍,设置了诸多吐蕃机构,皆系属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由于元朝重视发展生产,陇南吐蕃地区农、牧、商、手工业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且颇具特色。

[中图分类号]K28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03(2012)02-0001-08

元朝统一全国后,陇南地区分属陕西、甘肃两行省与宣政院管辖。陇南地区是吐蕃重要聚居地之一,其地东邻甘、陕,西北、西南与青藏高原相接,东北与北方至河西走廊与宁夏、内蒙等地。为了加强对吐蕃的镇戍,元王朝在这里设置宣政院所属的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属下机构,由于元朝政府重视发展生产,使得陇南吐蕃地区的民族经济也颇具特色。

## 一、军民万户府与总管府

元朝在陇南地区设置的机构,一是脱思麻路军民万户府;另一是西夏中兴河州等处军民总管府。脱思麻路军民万户府系司属机构之一。脱思麻,藏文ཐོས་མཁན་之汉译,是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下辖的两路之一,为较早和主要辖区,故也用以指称该司。脱思麻路为脱思麻军民万户府之简称,又有脱思麻

路总管府,与其关系密切,是管民与诸军奥鲁的机构。秩正三品,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一员,副达鲁花赤一员,副万户一员,经历一员,镇抚一员。据《汉藏史集》载,元代在吐蕃括户、置驿皆自脱思麻的丹斗水晶佛殿(在今青海化隆县境内)开始。其中脱思麻设有七个大的驿站<sup>[1]</sup>及诸多小驿站。大德元年(1297年)六月丙辰,赐“朵思麻一十三站贫民五千余锭”。<sup>[2]</sup>延祐元年(1314年)四月,因“西番诸驿贫乏”,元政府“给钞万锭”<sup>[3]</sup>赈济吐蕃三路驿站,脱思麻也为其中之一。

脱思麻路军民万户府的辖区,南及黄河河曲,北与河州路相接,西包贵德州等地,东与陕西行省、四川行省西部为邻。洮、岷、安西诸州及礼店文州蒙古汉儿军民元帅府、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等处宣抚司等皆在其管辖内。<sup>[4]</sup>

西夏中兴河州等处军民总管府,系司属

[收稿日期]2011-10-12

[作者简介]刘建丽(1947—),女,河南开封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西北少数民族史的教学与研究。

机构之一。为吐蕃等处宣慰司所辖两路之一的河州路 秩正三品 达鲁花赤一员 总管融 同知一员 治中融 府判一员 经历一员 知事一员。属官主要有税务提领 宁河县官 宁河脱脱禾孙五员 宁河弓甲匠达鲁花赤。据《元史》卷60《地理三》载 元初河州归“巩昌路便宜都总帅府”统辖 至元六年(1269年) 罢行省而设宣慰司 直隶于中书省。八年 立西夏中兴等路行尚书省 不久改行中书省 十年又罢。屡经变革 至元贞元年(1295年) 罢宁夏行省 以其地并入甘肃行省。根据吐蕃等处宣慰司属内有“庆阳宁环等处管军总把一员”和“凤翔千户所”来看 该总管府肯定存在过 当归此总管府直辖。

此机构真正归吐蕃等处宣慰司管辖的常设机构是河州路 是该宣慰司治所在地。曾一度与西夏中兴联为军民万户府 后则分立为路。《元史·地理志》载其领定羌(治今甘肃广河县)、宁河(治今甘肃和政县)、安乡(治今甘肃临夏县北莲花乡)三县。定羌县本吐蕃所置阿诺城 宋熙宁六年(1073年) 改为定羌城 金时仍沿用 元时升为县 曾为河州路治所。宁河县 本吐蕃香子城 宋熙宁六年攻克 置宁河寨 在州治之南60里。宋崇宁四年(1105年) 改为县 金时仍属河州。元朝因袭 后废为镇。又别有宁河寨 在州治东40里。至元九年(1272年) 在吐蕃西川界立宁河站 至元十七年(1280年) 都实受命探查黄河源头 是岁至河州 “州之东六十里 有宁河驿”。<sup>[5]</sup>此元代宁河驿即为吐蕃故香子城。元代在这里设有宁河脱脱禾孙五员 “掌辨使臣奸伪”。<sup>[6]</sup>又置“宁河县官”与“宁河弓甲匠达鲁花赤”。“宁河弓甲匠达鲁花赤”的职责是负责铸造兵器。显然宁河是河州路重要的军政据点。安乡县 本是吐蕃

所置城桥关 在州治东北50里。<sup>[7]</sup>宋元符二年(1099年) 更名为安乡关。“南至河州界35里”。<sup>[8]</sup>金朝时为安乡城 归宁河县辖属。元升县隶河州路。《明史·地理志三》载 河州 元河州路 后为右卫 “又南有宁河县 东北有安乡县 元属河州路 又东南有定羌巡检司。”

## 二、元帅府、都元帅府

元朝在陇南地区设置的系元帅府的机构主要有以下几种:

洮州元帅府 秩从三品 置达鲁花赤一员 元帅二员 知事一员。领可当一县。成吉思汗二十二年(1227年) 攻破洮州 元初归巩昌府 至元五年(1268年) 入西安州后 归属脱思麻路管辖。该州设有元帅府。泰定三年(1326年)五月 “洮州路可当县、临洮府狄邑[道]县雨雹”<sup>[9]</sup> 显然可当也在州内。该元帅府延续至元 明初即其地置千户所。

十八族元帅府 秩从三品 置达鲁花赤一员 元帅一员 同知一员 知事一员。《元史》卷5《世祖二》记载 至元元年(1264年)七月癸未 “以西番十八族部立安西州 行安抚司事” 归巩昌路便宜都总帅府管辖。至元五年(1268年) 割安西州属脱思麻路总管府。至元七年(1270年) 并洮州入安西州。至元九年(1272年) 忙古带等十八族参加平定建都蛮叛乱的军事行动 十八族元帅府一直存续到元末。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 “西番十八族元帅包完卜乣、七汪肖遣侄打蛮及各族都管哈只藏卜、前军民元帅府达鲁花赤坚敦肖等来朝”。<sup>[10]</sup>明太祖以其部立千户所 以包完卜乣为正千户 七汪肖为副千户。其地在洮、岷州之间 故亦称为“岷州十八族”或“洮州十八族”。

积石州元帅府,置达鲁花赤一员,元帅一员,同知一员,知事一员,脱脱禾孙一员。成吉思汗二十二年(1227年),蒙古军将领按竺迺“从征积石州,先登,拔其城”。<sup>[11]</sup>积石州本宋积石军溪哥城。元符年间(1098~1100年),为河湟吐蕃溪巴温占据。宋大观二年(1108年),臧征扑哥以城降,于是在其地建军。地在青海湖东100余里,西宁州界南80里。元朝因袭,置元帅府,隶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在河州西北部。潘昂霄《河源记》载,过贵德州,“又四五日,至积石州,即禹贡积石。五日,至河州安乡关。”此积石州在黄河岸边,贵德州与安乡关之间。元朝在这里设立脱脱禾孙,置有驿站及辨使臣奸伪的官员。

礼店文州蒙古汉军西番军民元帅府,官阶正三品,置达鲁花赤一员,元帅一员,同知一员,经历、知事各一员,镇压抚二员,蒙古奥鲁官一员,蒙古奥鲁相副官一员。《元史·地理三》记载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辖下“礼店文州蒙古汉儿军民元帅府”即此机构。显然蒙古控制这一地区较早,并在这里置官施政。

窝阔台八年(1236年),大将按竺迺“破宕昌,残阶州”,<sup>[12]</sup>继之攻文州(治今甘肃文县),谍知城中无井,乃断城中用水。攻克后,招抚吐蕃酋长勘陀孟迦等十族。以功为元帅,佩金符,“驻军汉阳礼店,戍守西和、阶、文南界,及西蕃边境”。<sup>[13]</sup>是时已在汉阳礼店置元帅府。《元史》卷133《暗伯传》记暗伯父“秃儿赤袭职,事宪宗,累官至文州礼店元帅府达鲁花赤”。宪宗时,此元帅府仍存在。嗣后,按竺迺之子国宝遣其弟国能等人“持金帛说降吐蕃”,一度反叛的吐蕃酋长勘陀孟迦从国宝入觐归附。国宝上奏说:

“文州山川险扼,控庸蜀,拒吐蕃,宜城文州,屯兵镇之”。<sup>[14]</sup>元世祖采纳国宝的建议,授国宝三品印,为蒙古汉军元帅,兼文州吐蕃万户府达鲁花赤,与勘陀孟迦皆赐金符。至元四年(1267年),国宝临终前又令其弟国安袭其职,后以其兄国宝安边功,赐金虎符,进昭勇大将军。至元十五年(1278年),国宝子世荣袭怀远大将军、蒙古汉军元帅,兼文州吐蕃万户府达鲁花赤,后以功进安远大将军、吐蕃宣慰使议事都元帅,佩三珠虎符。<sup>[15]</sup>弟世延继之为元帅,兼文州吐蕃万户达鲁花赤。<sup>[16]</sup>由此可知,礼店文州蒙古汉军元帅府、文州吐蕃万户府,设置有“蒙古汉军元帅”与“万户府达鲁花赤”,这些要职曾一度为按竺迺及其后裔世袭。

但是,这一机构当时并不隶属吐蕃等处宣慰司。据《元史·兵志一》载“初,西川也速迭儿、按住奴、帖木儿等所统探马赤军,自壬子年属籍礼店,隶王相府,后王相府罢,属之陕西省,桑哥奏属土番宣慰司,咸以为不便,大德十年命依壬子之籍。”这一部分探马赤军即是礼店文州等处元帅府军的主力。从壬子年(1252年)籍户之后即归礼店(治今甘肃礼县),隶安西王府管辖。王相府罢后(1280年)归陕西行省。桑哥执政时,奏归吐蕃宣慰司,大德十年(1306年),又归礼店文州元帅府。由于有时归省管,故《元史·百官七》记元帅府有李(礼)店文州等九府,“唯李店文州增同知、副元帅各一员,其余八府,隶吐蕃宣慰司,设官并同”。显然此时李店文州元帅府不属吐蕃宣慰司,但在第二年四月,元政府“诏礼店军还属土番宣慰司。”<sup>[17]</sup>从此则相沿不改。《明史》卷42《地理三》载,礼县,在秦州西南,元礼店文州军民元帅府,属吐蕃宣慰司。洪武四年(1371年)十一

月,置礼店千户所。元代在礼店还置有蒙古军万户府,大德十一年(1037年)七月,“以礼店蒙古军万户属土番宣慰司非便,命仍旧隶脱思麻宣慰司,防守陕州。”<sup>[18]</sup>其官员为蒙古奥鲁及其副官,其职责是管理随军来到礼店的蒙古军户。

元代在礼店驻扎有探马赤军、蒙古汉军,设置有蒙古汉军元帅府、蒙古军万户府等,在文州设置有吐蕃万户府,以后则合并为“礼店文州蒙古汉军西番军民元帅府”,成为其上级机构。其下辖有三个机构:

一是礼店文州蒙古汉军奥鲁军民千户所。秩从五品,置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副千户一员,总把五员,百户八员。主要负责管理随军而来的家属,即管理军户。

二是礼店文州蒙古汉军西番军民上千户所。秩正四品,置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百户一员,新附千户二员。似为直接管理蒙古、汉军、西番诸军的机构。

三是礼店阶州西水蒙古汉军西番军民总把二员。礼店,治今甘肃礼县;阶州,治今甘肃陇南市武都区西北,西水即西汉水。阶州唐初称武州,后更名阶州,宋因之,元代治柳树城,距旧城东八十里。“旧领福津、将利二县,至元七年并入本州。”<sup>[19]</sup>蒙古对这一地区用兵较早,1237年,按竺迺命“侯和尚南戍沔州之石门,术鲁西戍阶州之两水”<sup>[20]</sup>,此时这里已归蒙古管辖。元贞二年(1296年)五月庚辰,“土蕃叛,杀掠阶州军民,遣脱脱会诸王铁木儿不花、只列等合兵讨之”。大德元年(1297年)三月甲戌,“西蕃寇阶州,陕西行省平章脱列伯以兵进讨,其党悉平,留军五百人戍之。”<sup>[21]</sup>据《元史·兵志二》记载,这次战后,“诏留总帅军百人及阶州旧军秃思麻军二百人守阶州,余军還元翼。”因阶州系巩

昌总元帅府管内,嗣后这里常有战事发生。泰定元年(1324年)十二月乙亥,“陕西行省以兵讨阶州土蕃”。次年闰正月己卯,“阶州土蕃为寇,巩昌总帅府调兵御之”。<sup>[22]</sup>泰定三年(1326年)十一月,武靖王遣临洮路元帅盖盖招谕反抗的吐蕃部落。这种反抗与镇压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元末,顺帝至正十四年(1354年)九月,仍有战事。

永昌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是在元朝末年设置的,因中书奏“阔端阿哈所分地方,连接西番,自脱脱木儿既没之后,无人承嗣。达达人口头匹,时被西番劫夺杀伤,深为未便。”<sup>[23]</sup>于是在至正三年(1343年)七月戊寅,遂定置永昌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予以管理。置宣慰使三员、同知二员、副使二员,经历、知事、照磨等首领官各一员,令史十人,蒙古译史四人,知印二人,怯里马赤一人,奏差八人,典史二人<sup>[24]</sup>《元史》卷92《百官八》记该宣慰使司归甘肃等处行中书省管辖。《元史·地理志三》记“永昌路,下,唐凉州,宋初为西凉府,景德中陷入西夏。元初仍为西凉府。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降西凉府为州隶焉。”永昌路,治今甘肃永昌县;而西凉府,治今甘肃武威市凉州区,管内有众多吐蕃部族,其南临宣政院辖地及西宁州,地处河西走廊东段要冲。其职责主要镇守河西及与宣政院临接地区,对吐蕃负有一定的镇戍之责。设置该司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当地的蒙古人免受西番的侵害,说明其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下降。同年十月乙未,在永昌增立巡防捕盗所。至正十三年(1353年)四月,以甘肃行省平章政事锁南班为永昌宣慰使,总永昌军马,仍给平章政事俸。次年十二月,永昌宣慰使锁南班与宣政院使哈麻同为中书平章政事,进阶光禄大夫,

完者贴木儿继为永昌宣慰使。至正十五年(1355年)八月,受命“讨西番贼”。<sup>[25]</sup>至正十七年(1357年)五月丙申,“诏以永昌宣慰司属詹事院”<sup>[26]</sup>管辖。永昌之地在阔端失去治蕃权力、西凉州衰落之时,曾一度繁盛,由其子只必贴木儿镇守,此后则陷入颓败,元末各地战乱纷纷,永昌地位有所上升,这均与位于其南部的吐蕃地方局势的变化有一定的联系。

### 三、招讨使司

元朝在陇南地区设置的吐蕃等处招讨使司,官阶为正三品,置招讨使二员,知喇一员,镇压抚一员。《元史·百官志》“招讨司”条所载“土番”即此机构,其设置有“达鲁花赤一员,招讨使一员,经历一员”,显然因变化所致,二者唯设官略有不同。在陇南境内的附属机构主要有以下诸种:

一是文扶州西路南路底牙等处万户府。秩从三品,置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二员。文州,系至元九年(1272年)冬十月所立,治今甘肃文县。扶州,治今四川南坪附近,文、扶州以西、以南为吐蕃及其他部落杂居之地,在这里置万户府,加强对吐蕃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统治。

二是庆阳宁环等处管军总把一员。庆阳、宁、环等地均在今甘肃境内,与陕西北部、宁夏东南部交界,当为西夏中兴河州等处军民总管府存在时其管辖机构,设立未久,即行撤销,史无详载。

三是文州课程仓粮官一员。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辖下与文州相关的机构主要有“礼店文州蒙古汉军西番军民元帅府”、“礼店文州蒙古汉军奥鲁军民千户所”、“礼店文州蒙古汉军西番军民上千户所”、“文扶州西路南

路底牙等处万户府”、“阶文扶州等处番汉军上千户所”等机构。这一“文州课程仓粮官”当与征收科差赋税、管理粮仓、供给军用有关。

四是岷州十八族周回捕盗官二员。系负责岷州十八族地方安全的官员,其详细情况不明。

五是常阳帖城阿不笼等处万户府。秩从三品,置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元史》卷91《百官七》“元帅府”载有“当阳”、“帖城”。阿不笼地域不详。显然这一万户府是由两元帅府联合组成。

“常阳”应为“当阳”之形讹,“当阳”即“当彝”(或作“当夷”)。<sup>[27]</sup>“后周置县,又置洪和郡于此,郡寻废,以县属同和郡,随改属岷州,炀帝初,改属临洮郡,唐属岷州,神龙初并入溢乐。”<sup>[28]</sup>其地在岷州卫之西。据《新增岷州志》所载,“西魏同和郡溢乐县,周当夷县,和政县,俱在城(按:指岷州)西。”<sup>[29]</sup>元代在这里置当阳元帅府,又与帖城、阿不笼等合立万户府。明太祖时,改为“常阳千户所”,属河州卫。<sup>[30]</sup>

帖城当为“铁城”之音讹而致。宋熙宁六年(1073年),收复岷州后,于熙宁十年(1077年),置铁城堡(今甘肃岷县东北80里),隶岷州。元朝时,在这里置铁州(治今甘肃岷县东北),立铁城元帅府。《元史·百官七》作“帖城”元帅府,与当阳、阿不笼等合立万户府,与岷州皆属吐蕃等处宣慰司。顾炎武也谓铁城“在岷州东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置,元置铁州,属脱思麻路,后省。”<sup>[31]</sup>明代也曾在这一带置铁城、岷州和常阳三个千户所。

六是阶文扶等处番汉军上千户所。秩正五品。置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二员,系管理番

汉诸军的机构。其治地在阶州(今甘肃陇南市武都区)附近。

#### 四、社会经济

元朝宣政院所辖陇右吐蕃地区,自然环境独特,气候寒冷,除一小部分地区适宜农业外,大部地区都是高山、峻岭、荒漠、草甸、山地、草原,自古以来就宜于畜牧。

元代陇右吐蕃聚居的洮、岷流域与礼店、文州一带,是传统农业经济区,也是屯田的场所,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忽必烈征发文州新附军900人,在亚柏镇实行军屯,有屯田268顷59亩。这里的农作物品种主要有大麦(青稞)、小麦、荞麦、莜麦、豌豆等粮食作物,萝卜、芜菁、白菜、葱、蒜等蔬菜,油菜籽等油料作物。元朝时期,见于记载的农业工具仍然是犁、锄、铍、镰刀、多齿耙、筐等。农作物一年一熟,很少施肥,尤为忌用人粪肥,通常采用烧荒肥田,随犁下种,仍是运用比较落后的耕作方式。陇南文州也由于受“不杀生”宗教思想的影响,各地发生病虫害、兽害及风、霜、干旱等自然灾害,只能消极地祈求神灵保佑,从而影响了当地人们抵御自然能力的发挥与防灾减灾的意识。当地百姓一般饲养家畜,采集野菜及多种菌类植物补充生活来源,农业生产技术无明显进步。

据藏文文献记载,元朝时期,藏族聚居区分卫藏为法区,朵堆为人区,朵梅(朵麦)为马区,<sup>[32]</sup>朵麦即安多。据《安多政教史》所载,安多之名取自巴颜喀拉山东麓的阿庆冈嘉雪山与多拉山两座山名的首字,合并起来而命名。<sup>[33]</sup>元朝时期,属“朵麦马区”的今甘南藏族自治州仍是传统的主要畜牧区,畜牧业是其主要经济成分。而河曲马是产于甘、青、川三省交界黄河河曲地区(今甘肃玛曲

县)的良种马,即今所称的南番马。它适应海拔3000米以上的严酷自然条件,在形体、外貌、速度方面具有优良特性。甘南藏区还形成了小体型、瘦肉型的良种猪,这种成年猪只有五六十斤重,能耐寒,可终年放牧,因其喜食蕨麻(人参果),故称为蕨麻猪。这一猪种至今仍在饲养。

元代陇右吐蕃区的牧业工具简陋,牧民所用的工具只有皮绳、口袋、奶桶、驮鞍、粪耙、割草镰刀、割毛切肉刀等。有一种叫作“午尔多”(乌朵)的放牧工具,是将牛毛搓成粗线,再编成辫状粗绳,辫绳上端系一环套,中间编成椭圆形、巴掌大的一块,叫“午尔梯”,末端用羊毛结成鞭梢,用时将环套在中指上,捏住午尔多的两端,同时在“午尔梯”里夹置石子或硬土块,提起来振荡臂抡几圈后放开一端,石子(土块)就会飞出几十丈或一二百丈远,牧民用它调转牲畜,驱逐野兽,<sup>[34]</sup>节省了体力与时间。

由于采取的是粗放式牧业经营,仍是自然分群放牧,不修棚圈,不储备或很少储备冬草,牲畜在冬春时节,因缺食饿死现象严重。无专门工具采牛毛,用手或棍卷缠后拔取;采羊毛,使用梳子,或用小刀、镰刀割取,工效低且伤牲畜,反映了畜牧业发展水平的滞后与原生形态。

元代甘肃吐蕃地区还有少量狩猎户,元朝政府在河州路(治今甘肃和政县北),设有打捕鹰房猎户总管府,专门为官府打猎。其他猎户多以打猎为生活的补充来源。明洪武八年(1375年)正月,明政府在元朝建制的基础上,在河州置“失保赤千户所”。失保赤又作“昔宝赤”,蒙语意为鹰猎户,由此说明河州的狩猎业是一传统的经济部门。

元代甘肃藏区的手工业,主要是服务于

人们生产、生活的一些门类,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皮毛加工。这是吐蕃重要的手工业生产,由于这一地区畜牧业生产为皮毛加工业提供了原料,元朝时期,在宋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当时藏族皮革加工技术落后,大都用手揉制,百姓的衣饰材料为毛布、绒褐、毡毯、皮裘等,皆为自己加工制作。在纺织技术上,纺纱仍为纺轮,为木杆圆形,长约25厘米,直径2厘米,上端有一槽,下端缀一木制或铅制圆轮,每天一个人可纺羊毛纱约一斤左右。高级毛织品有氍毹,它是用一种有四根踏杆、四叶综框的木织机织出的,该机采用脚踏提综的复杂技术,织时有124根经线,2根一组,每隔6根纬线织进一根绒纬,并将其整齐地捲在事先准备好的长竹棍上,绕进6根底纬,再用剪刀将绕在竹棍上的绒纬圈从中剪开,形成毛绒。循环往复,织制而成。<sup>[35]</sup>

二是农具、家具制作。吐蕃传统手工业有矿冶、金属加工、制造、制陶等,铁、木、石器的制造技术自宋以来就较发达,元朝时期,当在此基础上有新的进步。农区传统的农具制造,如犁铧、铍、镰刀、耙、筐等,在史书中记载较多。民房建筑、军事防御工事、驿站设施、佛塔寺院的修建等,都是传统的手工业门类,在元朝中央政府的倡导下,有所进步与提高。见于记载的还有造纸、制墨、制腊等。甘青吐蕃还能制造出水上交通工具“革囊”。据《元史》卷63《地理志六》记载,黄河源有个叫九渡的地方,河水不大,可以渡马,从那里走四五日,“水浑浊,土人抱革囊,骑过之。聚落纠木幹象舟,傅髦革以济,仅容两人。”<sup>[36]</sup>他们所造的革囊可能是筏子一类的渡水工具。

元朝时期,陇右吐蕃地区的商业活动是以茶叶贸易为主的互市贸易。“元之茶课,

由约而博,大率因宋之旧而为之制。”<sup>[37]</sup>显然,元朝自初期就沿袭宋朝的榷茶制度。至元五年(1268年),元朝政府“榷成都茶,于京兆、巩昌置局发卖,私自采买者,其罪与私盐法同”。<sup>[38]</sup>此时榷茶由官府垄断,并严禁私售。元朝的榷茶制度比宋朝宽松,商人纳课以后,可以到产茶区采购,带到各地去出售,茶叶在西北地区的销售对象主要是西番人,其中也包括甘肃地区的吐蕃人,“西番大叶茶”<sup>[39]</sup>显然是吐蕃人喜欢的茶品种。

陇右吐蕃地区归属元朝中央政府后,在这里设置机构,统一管辖,这就为陇右吐蕃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陇右吐蕃机构设置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均具有鲜明的民族与地域特点。

#### [参考文献]

- [1]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 汉藏史集[M]. 陈庆英译.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6: 275.
- [2] [3] (明) 宋濂. 元史·成宗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412、564.
- [4] (明) 宋濂. 元史·地理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5] (明) 宋濂. 元史·地理六·河源附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1565.
- [6] (明) 宋濂. 元史·百官七[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2318.
- [7] [28] (清) 顾祖禹. 读史方輿纪要·陕西九[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8] (元) 脱脱等. 宋史·地理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9] (明) 宋濂. 元史·五行一[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1063.
- [10] [30] 明太祖实录二[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1179、1173.
- [11] [12] [14] [15] [20] (明) 宋濂. 元史·按竺迺

- 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2982、2984、2986、2987、2984.
- [13] (明) 宋濂. 元史·步鲁合答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3207.
- [16] (明) 宋濂. 元史·赵世延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4163.
- [17] (明) 宋濂. 元史·兵一·兵制[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2520.
- [18] (明) 宋濂. 元史·武宗一[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483.
- [19] (明) 宋濂. 元史·地理三·陕西等处行中书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1432.
- [21] (明) 宋濂. 元史·成宗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410.
- [22] (明) 宋濂. 元史·泰定帝一[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654.
- [23] [24] (明) 宋濂. 元史·百官八[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2338.
- [25] (明) 宋濂. 元史·顺帝七[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926.
- [26] (明) 宋濂. 元史·顺帝八[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937.
- [27] 张云. 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208.
- [29] 新增岷州志[M]. 陇右稀见方志三种[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4.
- [31] (清) 顾炎武. 天下郡国利病书·陕西上·岷州和政郡[A]. 四部丛刊三编本(第18册)[C]. 上海: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401.
- [32] 第五世达赖喇嘛. 西藏王臣记[M]. 郭和卿译.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3: 101 注释.
- [33] 智观巴·贡却乎丹绕吉. 安多政教史[M]. 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1989: 5.
- [34] 郭厚安、李清凌主编. 西北通史(第3卷)[M].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5: 291.
- [35] 陈炳应. 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丛书·纺织卷[M]. 南宁: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6: 524.
- [36] (明) 宋濂. 元史·地理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1564.
- [37] [38] [39] (明) 宋濂. 元史·食货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2393、2394、2394.

##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and Social Economy of Longnan Tibetan Areas in Yuan Dynasty

LIU Jian - li

( College of Litera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China)

**Keywords:** Yuan Dynasty; the Longnan Tibeta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social economy

**Abstract:**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governance of the Longnan Tibetan areas ,the Yuan Dynasty set a number of local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after it unified the whole country ,and all these agencies were subordinated to the High Pacific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 Since the Yuan Dynasty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developing production ,the agriculture ,animal husbandry ,trade and handicrafts of Longnan Tibetan areas got a certain level of development and ha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责任编辑:刘乃秀]

[责任校对:刘红娟]